

創作現象

散文：跨越文類，超越流行

◎陳信元

前言

一向標榜以品味、知識、文化為導向的四種人文藝術類雜誌：《誠品閱讀》、《當代》、《島嶼邊緣》、《雄獅美術》，相繼在八十五年停刊了；在面對市場的競爭壓力下，兩個晚報：《聯合晚報》、《中時晚報》的副刊喊停了，部分報紙的副刊早就進行著向大眾化、商業化靠攏的「陽謀」，壓縮了文學創作的生存空間。陳義芝在〈副刊轉型之思考〉文中坦誠指出：九〇年代末的副刊編輯必須更清楚地意識如何選稿：割捨長文（五千字以上），把一部分文學（文化）的責任，分給文學（文化）的雜誌及出版社去承擔；淘汰平庸的、複製性強的散文（雜文）；多作新「明星」的培植、新話題的開發。

根據《文訊》雜誌的粗估，八十五年出版的散文類著作大約有二百六十多種，其中十四種現代作家的傳記是由大陸作家執筆，顯然可見台灣的作家、學者，比較缺乏長期積累資料的耐心，也缺乏探索「五四」以來文學傳主靈魂的那一份激情與動力。八十五年散文出版的成績稱得上耀眼、豐收的一年，黃碧端、楊牧、簡媜、廖鴻基、楊南郡、楊照、李黎、張曉風、阿盛、陳幸蕙、席慕蓉等人，都有力作問世。各報的文學

獎從年頭到年尾，都有扣人心弦的演出，尤其是時報文學獎富有創意地以懸疑性、大眾參與的評獎方式，吸引了不少讀者的關注。報紙副刊仍然是散文創作者主要的發表園地，請參見本書〈刊物發表作品選目·散文〉部分。雜誌中，《聯合文學》、《幼獅文藝》等刊較重視散文創作的發表，《中外文學》製作了一輯「散文十大名家」專輯，其他的刊物乏善可陳。

徵文比賽的散文佳構

從年頭到年尾，各類文學獎的揭曉，總算為稍嫌冷清的文壇，妝點一些嘉年華會的氛圍。在台灣，大部分以公開徵文而產生的文學獎，都來自報刊、雜誌的年度例行活動，八十五年全國性、主要的散文類文學獎依次有：第八屆中央日報文學獎、第一屆山海文學獎、第十八屆聯合報文學獎暨吳魯芹散文獎、第九屆梁實秋文學獎、第十九屆時報文學獎等。

一項文學獎的最後結果，往往取決於種種條件的制約，包括：主辦單位的評審方式、評審的組合、評審的文學觀與對某類作品的偏好、文化思潮本身的變遷與風貌等。近年來，在不同評審組合的把關下，兩大報文學獎的得主常出現少數的老面孔，引發見仁見智的看

法，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林水福認為：既然徵文辦法上未作限制，就不該以「主觀的感情」因素加以排除；更何況與新人同台競技本身即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也是一種自我挑戰、自我鞭策的方式。

張啓疆是繼林耀德之後又一位深受文壇矚目與期待的專業寫作者，近年來以超強的創作實力，囊括國內各大文學獎。八十五年獲獎的散文作品中，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散文獎第一名的〈失聲的人〉，描述一位商場名流，在事業如日中天時因罹患聲門型喉癌而接受全喉切除術，失去了前半生引以為豪的口才和聲帶。出院後改用「氣管造口」代替無喉之喉，為殘餘的後半生重新牙牙學語。評審之一余光中稱讚這篇作品「文筆照顧周密」，「簡直難尋敗筆」，一度懷疑是林耀德的作品，謎底揭曉後，他在失笑之餘，客觀地指出：就此文而言，作者的表現恐怕比他的好友還好一點，更為溫厚。更難得的是，此文原為吐露重殘病人心聲的悲情苦作，卻能峰迴路轉，透出夫妻之情，求生之願，不但有其溫馨，而且不失諧趣。

〈失聰者〉是晉入時報文學獎散文類決賽的五篇入圍作品之一（後來獲首獎），張啓疆以一位患了「選擇性不語症」的孩子，來映照出社會的病態。評

審之一顏崑陽指出：這篇散文雖以自敘性「個殊經驗」為基調，卻能超越「個殊經驗」而賦予事關時代人心的「普遍意義」。姚一葦在評審會議中卻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失聰」是聲音的問題，作者利用患食道癌的「失聲者」作對比，會讓人懷疑其是否真為「失聰」者。

〈失聲的人〉、〈失聰者〉，再加上獲第十八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的〈導盲者〉，大致可以觀察到張啓疆企圖以「人」為中心的書寫關懷，誠如他所說：「以邊緣族羣為敘述主線，反觀主流社會的百相衆生，藉由殘障者的『不足』，諷喻正常人的『殘缺』」。余光中、顏崑陽不約而同肯定他在語言上的成就，已經超越了惡性西化與文白夾雜的流行困境，每能在穩健、暢達的常態之上，揮其妙筆，成為妙諦；在敘述層面，能很靈活的交替運用順敘、倒敘、插敘等。在議論層面能適度地操作一些醫學、生物學上的知識性語彙，創造了不少異乎流俗的比喻。

聯合報文學獎散文首獎柯嘉智的〈答問〉，是作者深入挖掘自己成長的經驗，卻能讓許多人感同身受，包括評審之一的施叔青都覺得題材很親切，「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成長的」，作品將所有青春期的症狀、孤獨、恐



張啟疆的〈失聲的人〉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散文獎第一名。

懼、寂寞，甚至對同性戀的嚮往，生理變化帶動心靈的掙扎，都寫得很深入，「最成功的，是鏡子意象的運用，他幾個自我認同的階段，都用鏡子表現得很好。」柯嘉智和張啟疆一樣，都是腳跨散文、小說兩文類的創作者，在八十五年，他還獲第十二屆巡迴文藝營小說首獎、第八屆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佳作。

時報文學獎散文入圍作品之一，王威智的〈遺址通知〉（後來獲評審獎），被黃碧端解讀為少年成長故事，敘述者藉著少年時代幼稚的、自以為是的「扮死人」遊戲，以及十年後獨自躺臥於出土石棺的罕有經驗，探討死亡與生命、人性的真諦。另一篇入圍作品，杜虹的〈珊瑚戀〉，不僅告訴讀者珊瑚的美、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也控訴人們、核電廠對海洋的污染。詩人楊牧在細讀這文中懸密交織的書寫之餘，感到「驚駭、喜悅，並甘心傾聽、注視，獲取新知教誨」，他稱讚任職墾丁國家公園解說員的作者，「以獨具創意的筆觸和大自然的大愛為我理出一深邃、遠大的意象世界，領我進入其中，如虛如幻，卻真實無比」。

八十五年的時報文學獎首度別出心裁採取先刊登各文類入圍作品，後評定得獎名次的作法，藉此「吸引更多關注，開闢對話空間，傾聽異端歧見」，

◎

主辦單位挖空心思與讀者互動的用心值得肯定。但從評審委員的一些談話中，也感受到某些文類創作者日趨減少的現象，金恆鑣、南方朔不無感慨地指出：報導文學的寫作面向有拓寬的跡象；但在掌握分寸、寫作水準、問題意識等都普遍表現不佳；以八十五年進入決選的九篇為例，許多居然與報導文學根本沾不上邊，有小說與散文體裁，更有非報導式的獨白、日記與遊記。其中獲得較高評價的有：林雲閣的〈山鬼的震怒〉（獲首獎），以嚴謹的態度探討盜採砂石造成環境破壞的問題；楊樹清、張煥宇、曾吉賢的〈消失的漁民國特〉（獲評審獎），追蹤報導被中共擄獲的台灣漁民國特之悲情命運；賴麗君的〈飄泊在大都市中的遊牧民族〉，親自走訪汐止鎮郊阿美族原住民寄居的花東新村，探討台灣社會長存的問題，如土地長久佔用、濫墾、公權力式微、原住民的困境、外勞問題等。

繁花似錦的散文出版

八十五年吳魯芹散文獎由黃碧端的《期待一個城市》（天下文化）獲得（另獲一九九六讀書人最佳書獎）。在中國人建立的城市中，香港、北京、上海各有特色和擅場，但只有台北是在「繁華中不曾間斷了四方文化的汲取，

文物意識不會被絕對的極權所否定，而國際經驗不會湮蓋了國族意識」。她體悟到：城市是文化的鏡子，鑑照鉅細靡遺的文化現象；她衷心期待一個屬於中國人的，有文化風格的城市，意識裏並以台北做它的藍圖。詩人痲弦指出：感性與理性兼蓄並攬、交光互影，是黃碧端散文的最大特色。她的文章，「洞察世事，練達人情，內涵質樸密質，說理周詳深邃，讀後常常給人以融會與相知的欣悅。」在本書中，作者呈現了自身與諸多藝術面向的內在互動，關懷城市的環境美學，反省市場機制、文化政策、視聽美育，探討印刷書與電子書閱讀與閱聽的平衡問題，剖陳當前社會病態、青少年次文化問題，流露了對下一代深切的知性關懷。

《聯合報》讀書人周報由文化人票選的「一九九六讀書人最佳書獎」，十大文學類好書中，有四本散文集。楊牧的《亭午之鷹》（洪範）彙集十年間「在一特定，重要的創作時期裏，心神交集之體會和領悟，筆端多涉自然與人文世界之交感，互通」，王文進將其視為「楊牧美學發展極致的代表」，並指出：從《年輪》、《搜索者》到本書貫串著他對散文文類各種可能性的試探與追索。書末專文〈瑤光星散為鷹〉，從〈亭午之鷹〉闡釋其領悟的文學理念：

「所謂散文，往往就和詩一樣必須在一真正準確的修辭與文法架勢裏，始能有機地發端，展開，完成，如前文不厭其煩縷述的，關於《亭午之鷹》的經驗，大致如此。」

誠如楊牧所說：文類的區分有時顯然多餘，從創作者的立場看，甚至從學術研究的觀點看，無不多餘。簡媜的《女兒紅》（洪範），是以介乎散文與小說之體裁完成，正印證文類間的畛域正逐漸模糊、互相滲透的事實。這本書主要收錄一九九一至九六年間作品，部分文章的創作期與《胭脂盆地》重疊，但題旨與表現方法各異，依王浩威貼切的形容，《胭脂盆地》像是置身男性社會裏的女子，用自己的睿智和伶牙尋求生存的漂亮表演；《女兒紅》彷如回到自己房間的女子，在黑夜的盆地邊緣，傾聽著身體深處寧靜的綻放。這正是一本探勘女性內在的書，不僅窺其情感奧秘，也聽其掙扎之聲。故事中的女人各有各的艱難行旅，簡媜追蹤她們的步履，摹寫女性的壯麗與高貴，並在「自己的閱讀中發掘也展現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九三、九五年，「討海人」廖鴻基分別以〈丁挽〉、〈鐵魚〉獲時報文學獎散文評審獎，評審蔣勳已觀察到：〈鐵魚〉顯然有寫小說的意圖，情

節、懸疑、對話、戲劇性的張力，構成這篇散文強烈的小說傾向。一九九六年，他以〈三月三樣三〉獲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也是介於小說與散文之間。作者筆下虛構的「海湧伯」，結合了他所遇到的討海人的共相，藉著虛擬的角色，他想捕捉的是一種真實感受的海洋性格，但「海湧伯」加上出海捕魚的歷程，卻常使人聯想到《老人與海》與《白鯨記》。彭瑞金認為前者並不以漁民或漁民生活為創作重心，它祇是海明威式的人性探索，發展他個人對宗教信仰、生活情操的體認。相較之下，彭瑞金肯定廖鴻基在寫作的目的和意義上，是朝著海洋文學的方向前行的。我們是否已擁有成熟的海洋文學？彭瑞金並未提出肯定的答覆，他認為：在沒有海洋觀點的生活和教育之前，我們很難擁有海洋文學；廖鴻基那散文味道很濃的描述文學，也還沒有能力勾勒出海洋文化觀點文學的具體規模。但他用素樸、生動的文字描繪真實的海洋景觀，擺脫盲目的大海頌歌或對大海無謂的猜忌，他勾起讀者恍如置身海洋的虛擬情境，一種置身大海、生活在大海的感覺，在他筆下如實呈現，一個屬於海洋生活的漁人形象，也被深刻地刻劃出來了。

同時榮獲時報文學獎推薦獎、聯合

報最佳書獎（非文學類）的《台灣百年前的足跡》，是楊南郡結合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的深度報導文學。馬關條約使台灣受到日本統治五十年，卻也使台灣為田野調查與學術研究，蓬勃發展了五十年，成為現今研究台灣歷史最好的基礎。本書循著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和鳥居龍藏的踏查足跡去印證台灣一百年前最真實的原貌；勾勒日治時代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早在甲午戰爭前二十年，替入台灣從事間諜偵察活動的事蹟；並介紹古道的探勘與研究。作者認為：從實實在在的田野見聞、踏勘與發掘，我們將會直接驗證真實的面貌，直接接觸到台灣各族羣永無止息的脈動。

攻讀歷史、以小說開始闖蕩文壇的易照，近年來又致力於撰寫文化評論、文學評論或文學史散論。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軍旅札記》中，以明快嘲諷的文字記錄軍旅生涯，而《迷路的詩》則以「繁複傷感的詠嘆從事更早年自我的挖掘和告白。」（張讓）這本書記錄楊照從十四歲到十八歲的成長心路，張大奮視之為「懺悔錄——一分比許多懺悔小說（Confessional Novel）更坦白供述的記錄」，吳鳴進一步將它定位為「較接近懺悔錄式的自傳體散文」，它沒有西方懺悔錄式文體那種過多的悔恨、自責或道德意識，有的卻是「少年



各類文學獎的揭曉，
是文壇的大事。

時代荒唐往事的再現，一種過往歲月的如實描繪，而不具道德訓誡之意味。」楊照寫作的目的，或許意圖記錄一個已經逝去的年代，並為那個浪漫、叛逆的年代留下一些歷史的見證。

李黎的《晴天筆記》（聯合文學），是一本真實而美麗的心靈之書，有對「生」之感念與對「死」之悲懷，簡楨稱之為「悲喜交織的嬰兒史」。第一部分「感懷四簡」記述驟然喪失愛子之後掙扎、療傷的歷程與心境；第二部分「晴天筆記」則是一位母親對於新生命從萌芽、出生、成長至兩歲期間的種種感受。另一本《世界的回聲》（九歌），有對世事人生的深情傾注、天涯行腳的心情記錄、對寫作和寫作者的心得感慨、對藝術創作的省思，及對生活周遭的洞澈觀察與欣賞。在國外旅居將近二十年的龍應台，選擇即將返台定居的前夕，在報紙副刊發表了一篇與新書同名的長文〈乾杯吧，托瑪斯曼〉（時報），不同於早期咄咄逼人的激烈情懷，她在檢索中外作家的流亡與流亡中的書寫時，也同時檢索自己在異國飄泊的心情，以及對故鄉人、故鄉事的戀戀不捨。她幽幽地寫道：「所謂放逐，必須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遠離中心和自身存在意義的邊緣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我也是一株

向日葵，貧血的臉孔朝著東方，太陽昇起的地方。」誠如鹿憶鹿所言，龍應台掙不脫她的華人情結，一個作家總要一塊土地，自己的土地。人在天涯，心繫兩岸，是所有華人作家共同的現象。

張曉風的《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九歌）和阿盛的《五花十色相》（九歌），都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的專欄結集。前者以小事小情的深蘊為主，或倡導環保，關懷城鄉的變貌，或細繪兩岸糾結的愛與愁，憐悵萬事萬物的生之苦，珍惜當下的生之樂；後者是以聊天講古心情看遍人間事，書寫人事物景的紛雜多樣，作者用一半清醒一半醉的另類人生哲學，寫出「飲食男女日子」、「笑啼人生如戲」、「奇聞異事聊哉」、「搖鈴走看世間」等精彩篇章。席慕容的《黃羊·玫瑰·飛魚》（爾雅）也收入十六篇寫於一九八九年的「四塊玉」專欄，以及一九九一年《江山有待》出版之後所寫的散文，其中有對藝術家、美術教育、文化環境的關懷，也有對蒙古故鄉風土文物的禮讚，對少數民族困境的不安，就如她在〈自序〉中所說：「那初見蒙古高原時將我沒頂的洪流已經消退，而原鄉的黑暗與劫難，又將我帶上了一個充滿了暗流與漩渦的長河。」但她從自身的經驗也學習到換一個角度去觀察，

將原來累積在心中的挫折，轉變為反省與觀照的成長來源。

陳幸蕙的《愛自己的方法》（爾雅），是她以世間關懷寫了「現代女性的四個大夢」和「青少年的四個大夢」系列之後，又一次回歸到純為發抒一己情懷的純散文創作。它處理的主題是倫理——自己與自己的關係、自己與別人的關係，以及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八十四年九月，張愛玲去世後，對她的懷念、追思活動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八十五年初出版的《我的姊姊張愛玲》（時報），由張子靜提供資料，季季整理撰寫，從這本「張愛玲前傳」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學典範；司馬新的《張愛玲與賴雅》（大地），正好是一部「張愛玲後傳」，滿足了讀者對這位神秘作家後半生的窺探欲；還有大陸作家宋明燁的《浮世的悲哀——張愛玲傳》（業強），充分利用各種新出的資料與研究成果，重建張愛玲的生命情境。其他傳記類的作品還有：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的《柏楊回憶錄》（獲選為金石堂一九九六年最具影響力的書），是一部政治犯的生命史；林太乙的《林家次女》；曉風的《九死未悔：胡風傳》、樂梅建的《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傳》（業強），汪家明、于青的《豐子愷傳》（世界）以及「新潮社」一系列的

作家新傳。

從「旅行文學」談起 ——兼談報刊雜誌的散文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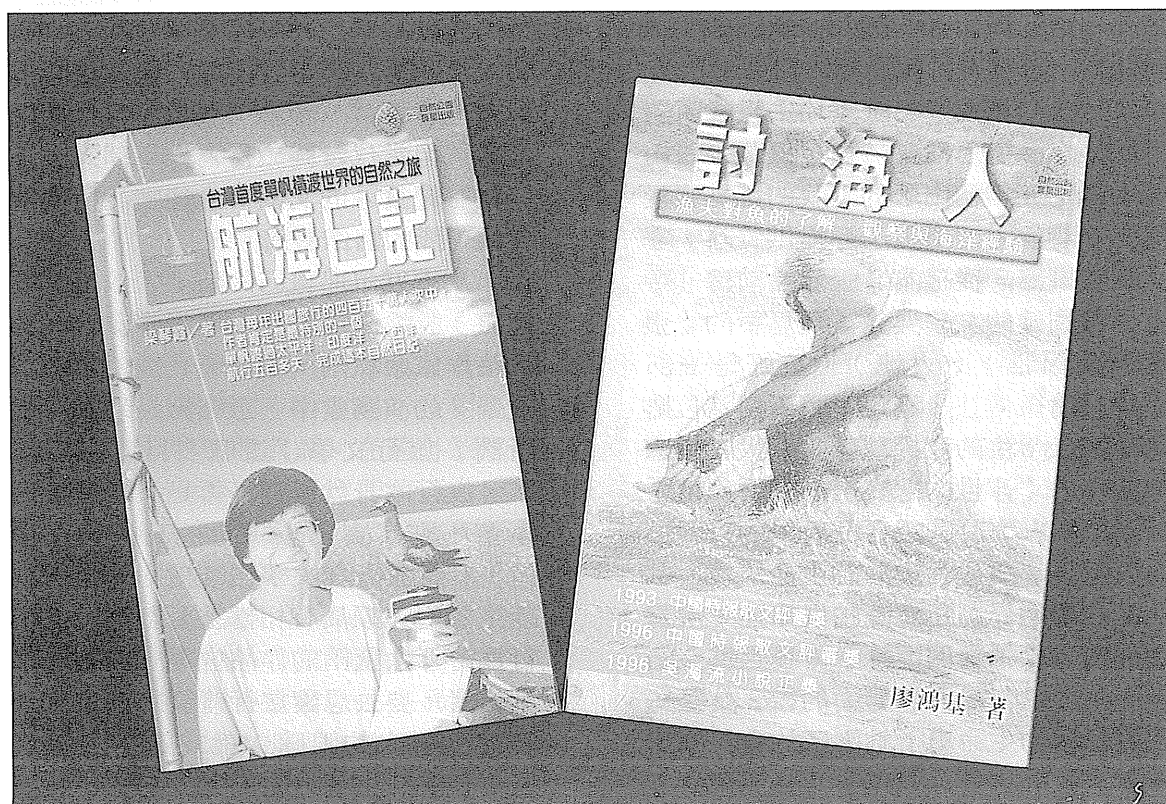
旅行的諸般興味是相當個人的感受，因此，旅行文學的書寫，也就隨著作者的風格，而有不同的樣貌。胡錦媛指出：就形式而言，它可以跨越詩、散文、小說等各種傳統文類的固定疆界，可以包含抒情、議論、敘事、書信與想像等。但當代台灣旅行寫作者卻大多拘泥在「紀實」的文類，未能去開拓其他各種可能的寫作形式。

八十五年耶誕節的前夕，以《文化苦旅》、《山居筆記》等書享譽台灣的大陸作家余秋雨，在一場名為〈旅行與文學〉的演講當中，意味深長地說：當所謂「旅行文學」這個名目產生的時候，旅行本身就已經不再是一項單純的事情，它其實已經具有很高的人文價值，「當旅行與文學相碰撞的時候，就產生了對人類具有相當重要影響的文化行為。」余秋雨的作品曾經「提醒」了創作者，要去思索旅行背後的意義，張讓的〈旅人的眼睛〉就寫道：一個旅人，「不能在幾天之內吸取屬於一個地方的精神，以當地的山水人文為自己的血肉素質，風格性情，充其量只能是眼睛的看。」鴻鴻的〈亞維儂象徵〉以斷

橋和高塔上的演員所象徵的意義，作為對法國普羅旺斯第一大城亞維儂藝術節慶的深深憶念。他們都在追求來自真實的感動，並進入了時間和空間，成為那個地方的一部分。

這一年以旅行為題材的散文作品相

當多，形成一個深受矚目的寫作趨勢。作家的足跡幾乎遍及世界各地，結集出版的有：愛亞的《走看法蘭西》、阿嫻的《性格女子獨闖巴黎》、林玉緒的《浪漫出走義大利》、張寧靜的《陸地的盡頭》、丘榮襄的《旅行，真好》、



「海洋文學」是一個新的散文類型。

孫瑋芒的《夢幻的邀請》等，其中有對異國風土民情的人文關懷，也有對大陸山河人事的文化省思。陳世一的《綠色旅行》，在一片「走出」台灣聲中，是個難得的異數，他提倡結合認識本土文化、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觀念的「知性旅遊」，試圖重建本土旅遊更深層內涵，將台灣土地多元的價值解放出來。梁琴霞的《航海日記》，記錄作者以一年多時間單帆橫渡印度洋、大西洋與太平洋的環球壯舉，她認為：探險是一趟發現之旅，它最令人著迷與滿意的就是逐步以嶄新的目光與視野觀看，對每一個探險者來說，過程與結果都是充滿驚奇而屬於自己的。在報刊雜誌上令人印象較深刻的旅行書寫者還包括：荊棘、呂大明、黃光男、梁丹丰、席慕蓉、蓬丹、葉維廉、鄭愁予、張典婉、師瓊瑜……等人。

早在九〇年代初，就有人預言「自然寫作」將是未來台灣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對於這種新興的文學類型，王家祥認為它比較接近深層的「環境教育」，著重在挖掘自然意識的覺醒力量，透過文學心靈的導引而進行。陳健一則指出：「自然寫作」背後的深沉環境意識，更填補了長期以來人們疏離環境、土地的困境。劉克襄、王家祥、陳健一都是較能充分掌握「自然寫作」的

概念，並極力宣揚這股風潮的創作者，在八十五年分別留下包括：〈走過箭竹草原〉、〈秋日的聲音〉、〈介於關渡與唶里岸之間〉在內的多篇作品。在這塊園地，還可以看到凌拂、洪素麗、陳冠學、陳世一、陳煌、粟耘等人孜孜耕耘的身影。

在八〇年代末期，「原住民文學」開始受到台灣文壇的矚目，成為另一種新興的文學類型。蕭蕭曾在主編《七十九年散文選》時說道：「以漢族為生活中心的台灣社會，我們真的忽略了原住民九族文化的生活形態，……。在文學創作中，這一環相當貧乏。」劉克襄則從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環境去思考，得出結論：「原住民文學」絕對是與「自然文學」產生密切對話關係的文類；它和「自然寫作」有相當的重疊性。八十五年二月，最具規模且專為原住民設立的首屆山海文學獎揭曉，散文組由思慕伊·阿基（曾修媚）的〈山野笛聲〉獲第一名；遺憾的是，母語創作類散文組（還有其他類組）前三名均從缺，反映了新一代原住民對本族的歷史與母語的疏離與失落。解嚴之前，即以漢名活躍於文壇的瓦歷斯·諾幹，仍然創作不懈，〈哀傷一日記〉、〈奔赴多納之日〉俱是值得細讀的佳作。